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李辉 主编

梁漱溟

汪凌 著

大象出版社

乱世中特立而独行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梁漱溟

乱世中特立而独行

汪 凌 著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漱溟:乱世中特立而独行/汪凌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 2008. 10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47 - 5033 - 5

I. 梁… II. 汪… III. 梁漱溟(1893 ~ 1988) — 生平事迹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8617 号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梁漱溟:乱世中特立而独行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汪 凌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崔 靖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(总编室电话:0371 - 63863572 发行部:0371 - 6386355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定 价 21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

电话 (0371)65957860 - 351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、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像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、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“吃饭好好吃，睡觉好好睡，走路好好走，说话好好说，如此之谓敬。敬则不偷不肆，敬则心在腔子里，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。由敬而慎，以入于独，而后心才发光明。”

梁漱溟先生是一位逸出生活常规的人，这是我在阅读了许多有关书籍、材料之后得到的印象。对他的评价和界定，很难一言以蔽之。闭上眼睛，我的脑海中能清晰地浮现出他的一生行状。可是，必须承认，对他每个阶段行为的指导思想，把握起来并不容易。尤其是，他一生当中贯穿的儒佛二家，对于我这个虽出身中文系却没有接受过正规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来说，虽然也有持续的关注和了解，但要阐释这样一位思想大家，仍显得极其不够。从梁漱溟身上，可以窥见许多中国的现实问题，农村、教育、学术和良知、宗教、中医、养生……这也是我迟迟难以下笔的主要原因。

然后我就想，每个人都能从梁漱溟先生那里得到自己的所需，我要做的，就是以我的学养和阅历，写出我所能理解的一代大家。

梁漱溟首先是以中国乡村教育实践家的身份，引起我的关注。

近年来，农村、农民、民工、城乡壁垒等问题，因为政府和媒体的强势介入，开始频繁出现在国民的视野当中。实际上，100多年来，因农村问题关涉中国社会、文化、政治、教育诸多方面的“现代化”问题，一直以不同的面目和规模，出现在一些先贤的学术和实践活动中，比如20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的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，等等。可以说，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广大的乡村社会始终发散着显在或潜在的力量和影响，知识分子也以一种个人的、在野的身份（间或，也被纳入主流）介入其中。

梁漱溟一生光明磊落，从不随声附和。



像中国任何一位社会思想活动家终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、农民，梁漱溟也如此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，就是他多年观察、思考、实践的结果。而且，在实践过程中，他的观察和思考在持续着，既包括和民众的互动、和政府的互动，也包括对乡村建设理论的调整。

农村，一个与其生活毫无交叉的世界，是如何进入梁漱溟的视野？

这与他的人生观、学术观有关，穷其一生，他始终为两件大事奔忙——人生问题，人活着为了什么；社会问题，中国向何处去。此外，也与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探索、改造活动有关。

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，一方面，清政府闭关锁国，妄自尊大；另一方面，西方列强却迅速崛起，扩张开拓殖民地，中国成为“瓜分”对象。更严重的是，面对危局，中国传统文化颓如山倒。一些社会精英失望之余，弃传统文化如敝履，先引进西方科技，又进而鼓吹西方文化、制度，希望将中国旧有的一切都取而代之。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，就是从学界推进到社会其他阶层的社会政治运动，以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“打倒孔家店”，荡涤旧文化，尊西洋文明为师，并渐成压倒之势。

当时，年轻的梁漱溟先在报界供职，后进汇聚风气的北京大学，对时局、对中西历史多有观察和研究。最初他也认为，英国宪政是一个好的“政治模



1935年，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，一些乡建同人合影于山东邹平。前排左一为梁漱溟，右二为晏阳初。

型”。可是，经历了建立民国的种种事件后，他意识到，英国宪政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，再经各方推波助澜，终至水到渠成；中国国情却不是这样，自有一套千年文化养育而成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，虽然引进“德先生”，国民政府建议会，颁宪法，老百姓不懂，各路军阀不认，“拿来主义”并不能药到病除。他认为，“要改造中国政治，必须从基础做起”。

“从基础做起”，当我站在一个世纪后的立场看百年历史，尤其感触深刻。国家频频遭遇“灭种”危机，导致掌舵者往往处于仓促应对的状态，想即刻挽住没落颓势，却没有机会和力量，去形成一个贯穿老中国与未来新中国的治国思路，更遑论在一点一滴的累积、延续中不断完善。

面对文化危机，梁漱溟声言，中国不必、也不应抛弃传统文化。在北大，他发现西式教育的引进，给中国教育带来隐患，只重知识技能，废德行修养，文化传承更无从说起。在他看来，西方教育不过是对生活手段的培养和训练，却不能顾及学生的全面发展，解决人生中的“烦闷”。他在古圣贤经典——先秦孔子和明末王阳明中发现了合理的教育形式，以为，传统教育重“情志”，是

指向人生的和谐。渐渐地，他萌发了聚合师友门徒，自己办学，共学共长的念头。以梁漱溟一贯的做事方式，“思想之后即付诸行动”，他寻找着恰当的机会。

这时，王鸿一出现在梁漱溟的朋友圈子中。

王鸿一是山东的维新人士，和当时很多持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他重视教育，曾以山东省教育厅长的身份，在全省建立新式学校的网络。看起来，这是一位眼光开阔、思想新锐的传统绅士。虽然并不排斥吸收和引进西方实用的、强国强民的科学与技术，但他更倾向于以儒学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底子，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体系能够支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，这与梁漱溟不谋而合。对现实的关注，使他注意到当时河北定县翟城村米氏家族的试验。我在阅读历史中发现，当国家危难时期，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走两条路，一是眼光向上，寄希望于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；一是眼光向下，走向基层，从局部的一点一滴做起。而在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中，更多是对前者的宏大叙说，中国强权专制的政体模式，也有意无意引导知识分子用力于此。可是，实践证明了，当广大民众依然蒙昧，战士在旷野上呐喊，除了空洞的回声，还有密密麻麻的看客。这就是鲁迅的深刻！因此，当我梳理中国乡村建设史时，那些一一浮出水面的“行动”知识分子，令我格外感叹。

1902年，翟城村乡绅米鉴三有感于当地



王鸿一先生。

有一次梁漱溟先生写信给我，说这一问题非笔墨所能争，他拟去南京时与我当面讨论这一问题。当时梁先生是鼎鼎大名的“社会名流”，去南京蒋介石必亲自延见，优礼有加。但他不惜屈尊枉驾，来到寒舍，与我讨论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，这也可见梁先生对问题是非常认真的。……在讨论时，我发现梁先生的主观很强，自信力很深。他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，更不用说有阶级矛盾了……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农村确有阶级，并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，同他辩论，结果只是徒劳。

千家驹

贫富分化、贫弱无助的现状，把一些困难农户组织起来，开展村民互助。不久，米鉴三之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来，受日本农村新建设的启发，企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。米家的改良引起了时任定县县长孙蕓斋的兴趣，他帮助米家把教育和习俗的改革，扩大到乡村政府的自治。后来，孙到山西担任过短期的省府主席，米家试验被介绍到这里，并被阎锡山等人接受。当阎锡山主政山西后，开始在乡村实行一套村、闾、邻、农户的四级组织管理系统，反盗匪、反吸鸦片、反缠足，是为山西村治。这是后来的事了。

可见，在20世纪初，虽然呈零星状态，已经有知识分子倡导并介入到中国乡村的改革试验当中。

梁漱溟身处大学堂，却关注、思索着中国社会的走向。1920年，他在北大作题为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”的演讲，被王鸿一得知，随后王进京访梁，并邀其赴济南讲演。二人开始交往，彼此印象深刻。可以认为，从这时起，梁漱溟的眼光从大学转向乡村，乡村教育和自治试验开始进入他的视界中。

1923年春，梁漱溟应邀往山东曹州中学讲演，初步提出“农村立国”的设想。他倾向于缓和的改良、循序渐进的变革，稳步求得社会的进步；并且，他寄希望于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启蒙，自下而上地使制度发生变革。“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，才能发生大的力量，而后再影响于都市。”中国是一个村落社会，离开这个基础的任何建设，都有可能如沙地起楼。可是，改造中国政治，是否必须从农村做起？在当时，梁漱溟还不十分明确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24年，王鸿一邀他前往曹州办学，给梁漱溟提供了一个实践和探索的契机。通过此次办学，他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认知得到了考验，并将厘清当时依然含混的思路。

1924年秋，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职，带了几个学生来到山东，接办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，并创立重华书院。本来，山东一些有实力并持文化守成主义的绅士想在曲阜办一所大学。梁漱溟却考虑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思路仍嫌模糊，而思路不清的行动在他看来是危险的；此外，他和这些山东绅士在办学理念上有区别，他是实用主义的信奉者，并不排斥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。于是，他提出折中意见，先办中学，时机成熟后再办大学。

在《办学意见述略》里，他说明了办学宗旨。他真的是与众不同！他声明：“我们的真动机是在自己求友，又与青年为友。”先说“求友”，便是“想得些

有心肝的好汉子，大家彼此帮忙走路”。中国往何处去？这是梁漱溟一生穷究不止的问题，他要将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起来，使朋友团体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，彼此激励鞭策，共同求人生向上，谋社会改革。

而“与青年为友”，则关乎他的教育观——教育是帮助青年走路。阅读梁漱溟文章，我深刻的感受之一是，他的语言非常生活化、口语化。我想原因大概是他向下的目光，希望一般识字的人，读了他的文章就能明白他的思想。“走路”之说便如此。青年走路自然是往前发展，在梁漱溟看来，发展不只是在知识技能上，应该是全面发展，因此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“体质、资禀、性格、脾气、以前的习惯、家庭的环境、乃至他心中此刻的思想问题——而随其所需，随时随地加以指点帮助……”在他的意识里，学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，而是可以成为朋友团体中的同路人。

落实到具体的办学规则上，其中之一，基于“彻底地信任天下人”原则，打破收费惯例，学生凭自觉可交费可不交费、多交或少交。显然，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观，和现实有太遥远的差距，后来直接导致了这次曹州办学的失败。

在学校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，老槐树盘根错节，枝繁叶茂，夏日里撒下一片阴凉。槐树下放一张书桌，常常就成了梁漱溟的讲堂。他的演讲不拘泥主题和形式，往往有感而发，讲谈自己对某事、某物的感触，开启学生的胸襟和

1921年，山东学界欢迎梁漱溟等人时合影留念。后排左七为梁漱溟。





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从性情、智慧、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，在这种时代，要找这种人，已经不太容易了。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，都有真知灼见。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、名流不同，像胡适之、梁任公等“时代名流”，没有一个超过他的。

牟宗三

1933年，梁漱溟与山东研究院同事在一起。

思考。有一次，他抨击军阀混战导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，谈起自己在当地的见闻：他住在一个学生家里，一天晚上吃完饭出门散步，却看见一个三四岁小孩和一个白发老人啃黑窝窝头充饥，这让他愧疚万分，因为他吃的是白面馒头。他愈讲愈激愤，为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而痛苦，为自己一个壮年人不能救助老弱而内疚，他拍着桌子，泪水从眼镜下雨点般地流下。

曹州教学，使一直生活在城里的梁漱溟对农村有了近距离的体察。社会贫富不均，他要在校规中均贫富、示公平，比如量力交学费。开学第一个月伙食尚能维持，第二个月勉为其难，第三个月钱粮告罄。有的学生第一个月不交钱，第二、三个月依然不交；已交费者更不愿多交钱，声明仅供自己读书，没有力量代人交费。如此等等，梁漱溟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了壁。后来，王鸿一介入地方军阀纷争，梁漱溟无形中也卷入其中，半年后，在1925年的春天，当大地萌发出点点绿意时，梁漱溟一个人先离开了学校，折返北京。

这是梁漱溟的第一次办学经过，当年他33岁。虽然他不是书斋中夫子式的人物，和社会的接触不可谓不密切，但直接和地方政治发生关系，曹州行是第一次。他是一个思虑深、立身谨的人，当发现自己全心投入、与中国前途相关的教育大事被人利用时，便立即抽身而出。



1935 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时，于办公室门前留影。

曹州之行失败后，梁漱溟和追随他的师友，先在北京什刹海附近、后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，研讨儒学和心理学，日后梁漱溟具有标志性的讲学方式“朝会”，即从这时开始。所谓“朝会”，是黎明时分，师生露天围坐一团，静默省思。此时星疏月残，天地一片寂静，人在此间心地最清明，最能培养朝气和蓬勃上进心。

政局依然动荡，北伐战争从发生、高涨，到以失败告终。梁漱溟在这段退隐的日子里，拒绝各方邀请，专心读书讲学，整理父亲梁济的遗稿；同时，派遣学生前往北伐前线，借以观察时局。1927年国民党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，使梁漱溟彻底放弃在中国施行西方政体的希望，坚定了“农村立国”思想，他要从乡村培养新制度的萌芽。

1927年春末，梁漱溟携夫人、长子和学生经上海到广东，与当时留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、代总司令李济深会面。李济深是他相交多年的老友，北伐时曾多次邀他南下。此时，他一面乡居读书，一面找机会，终于说服李在广东施行乡治试验，进而推进社会改革。随后，他接受了广州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职务，提出开办“乡治讲习所”的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。有了实权人物支持，梁漱溟的理想似乎有望实现，他准备以一中为基地，为在广东推行乡治做准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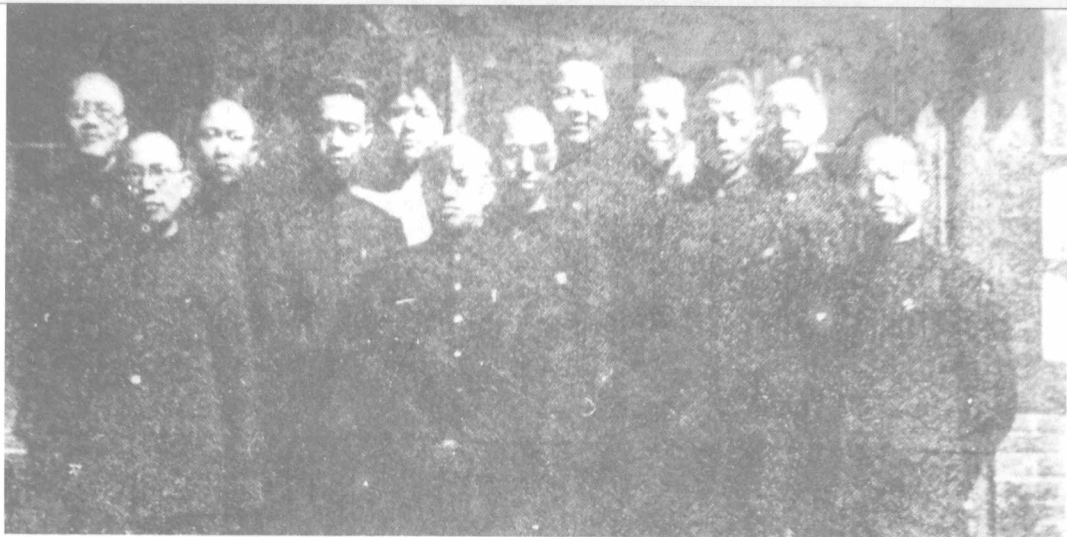
当梁漱溟上下探索的同时，在国内各地，一些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

对中国乡村的改革试验，也一直以个体介入的方式持续着，他们从城市平民教育开始，逐渐转向农村农民，并形成了几个颇具影响力的试验区；无须讳言，农村问题也引起一些北方军阀和国民党官员的注意，一些地方主政者也在辖区之内，进行乡村改革。闻名的，在华北地区，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会、阎锡山的山西乡村自治和村政；在华东地区，有陶行知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示范学校、黄炎培的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等。

这些，都引起梁漱溟的兴趣，起了前往考察的心意。1928年春，梁漱溟前往南京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示范学校参观。陶行知出身贫寒，从美国学成归国后，即投身教育改革。他从平民教育始，逐渐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。在南京远郊的晓庄，他建起晓庄师范学校，师生共同学习、生活和劳动，要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、有科学的头脑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人。

晓庄经验，令梁漱溟深为赞赏。回到广州，他明确了一中将要施行的改革，依然是山东曹州办学理念的延续，即，教育是对学生情志的养成和发展。为此，校方辞退了服务学生的50多名校工和大部分职员，关闭学校里的商店、饭馆、西餐厅和洗衣店；同时，学生自治，教师从旁帮助，过一种朋友相携共学的团体生活；当然，他仍然希望对穷学生减免学费……提出方案后，梁漱溟把具体的执行事务交给自己的学生。1929年2月，他再度北上，往江苏昆山、河北定县、山西太原等地，考察乡村运动，求取经验和人才。

山东邹平时期，梁漱溟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一起。前排左二为梁漱溟。



然而政局多变，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，缺少了实权人物的支持，广东乡治试验的设想就此落空。而此时，他的朋友王鸿一正积极筹备河南的村治活动。

王鸿一一直在北方致力乡村改革，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乡村改革杂志《村治月刊》。当时，冯玉祥控制着河南等地，并且是南京陶行知和晓庄精神的坚定支持者。1929年夏末，因为政治格局的需要，冯玉祥和蒋介石结盟，同时开始在河南开展乡村重建工作，韩复榘作为冯的主要部属，负责实施这个计划。正是这个因缘，埋下了后来山东乡村建设的伏笔。在王鸿一的村治团体中，包括河南知识分子彭禹廷、梁仲华和王怡柯。其中，彭禹廷当过冯玉祥的秘书，有感于家乡匪乱，从乡村自卫进而有意识走向乡村自治。

就这样，王鸿一等人争取到冯玉祥的支持，筹建了一所专门研究乡村问题并培训青年乡村工作者的学校。当广东乡治计划受挫，梁漱溟便接受了他们的邀请，加入河南的村治活动，并应邀接手《村治月刊》的主编工作，从此他有了一个建言的论坛。

1929年10月，在河南辉县百泉，河南村治学院问世。

百泉东临山东，西接山西，北面有一座苏门山，山下有一大湖，方圆数百亩，据说山清水秀，不下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。大湖底有数百泉眼，泉水涌动，似串串珍珠，“百泉”之名由此而来。院长由彭禹廷担任，梁仲华任副院

当年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推行县政改革，消除“公文旅行”的积弊，在县政府设立联合办公室。

